

# 铁笛横吹月上船

——行吟南郊之五

刘正武

名山大川，如果有知名隐士曾深藏其间，行吟长啸，自然会添色增采。湖州从传说时代开始，仕宦文化有多盛，隐逸文化就有多强，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种隐逸文化的酝酿和滋生，又与东传的佛教、本土崛起的道教一起，组成了三重合唱。

个人抱负无法实现的时候，隐逸是最安全和投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自我归宿，而非因自我期许无法实现而制造混乱和暴力。这是隐逸文化的源点。而不与世苟合，“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”、“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”的说辞，更加为隐逸文化做了精神先导。

晋宋之际，吴兴望族沈氏子弟由于以武力参与王朝权力之争，不断遭受灭门之祸。沈麟士、沈约等出现后，在儒家经学和道家思想、佛学精神等等风潮习染下，苕霅隐逸文化更加兴盛。至中晚唐，颜真卿、陆羽、张志和、皎然等已经刻意营造隐逸的意象，来制造湖州区域意即“隐逸”的内涵。他们创造出“苕霅”意象，来隐喻隐逸文化。如张籍《霅溪西亭晚望》“霅水碧悠悠，西亭柳岸头”，如杜光庭《仙传拾遗》记录“刘商泛苕霅间，卜居武康上强山下。”皎然：“隐身苕上欲如何，不著青袍爱绿萝。”这里的“霅水”“苕霅”“苕上”，俨然就是“隐逸”的代名词。

到宋代，这种观念进一步强化。隐身湖州苦心编撰的胡仔的书称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，方勺宣称自己的居所就在张志和浮家泛宅处，把自己的书命名为《泊宅编》。苏东坡经历“乌台诗案”饱尝宦海浮沉后也感慨地写道：“但得低头拜东野，不辞中路伺渊明。舣舟苕霅人安在，卜筑江淮计已成。”在陶渊明、孟郊、张志和等一系列的文化联想中，“苕霅”的隐逸内涵也被一步步强化。梅尧臣：“昔爱伊与洛，今逢苕与霅。南郭复西城，晓色明于甲。尘缨庶可濯，白鸟谁来狎。落日潭上归，鱼歌自相答。”“伊与洛”的文化意象在于揭示追求建功立业的宏大理想，“苕与霅”的涵义则体现了与之完全相反的隐逸文化意蕴。

南郊是湖州苕霅文化亦即隐逸文化最丰厚的地区。东晋末期吴兴郡城搬迁至今湖州城之后，原址上的很多古迹依旧不断被后人凭吊瞻仰，也有无数的隐士高人蛰居其间，隐逸终生。

大明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春，孙太初（名一元）第一次来到吴兴。此前他从故土陕西出发，已经游历了今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江西，足迹半天下，又交游天下名士。在诗文翰墨中，引起天下豪杰、名公巨卿重视。本来明代的士人，大多走正途一科：为出人头地，无非兀兀穷年读书，然后科第求中榜，以秀才、举人、进士一路考上去，官阶品位也一路升上去，才是人生荣耀。但是这位孙太初先生偏偏不是如此，他18岁就步李太白足迹，壮游天下。八年后到江浙一带，在苏州交接沈周、文征明、祝枝山、徐祯卿、方太古、杨循吉、王鏊等名士，然后又至杭州，与殷云霄、

郑善夫、顾璘、吾瑾等熟识。一介布衣，不巴结权贵，仅以诗文倾动王侯，令举世为之肃然者，孙太初为当时第一人。

26岁的孙太初来吴兴，是应长兴吴琬之邀。吴琬字汝秀，号甘泉，是吕山望族吴氏中佼佼者，经数代积累而为富，偏也是不喜做官而好作文的奇人。他20年不出家门，博览群书，潜心研究，著《经史文编》30卷、《天文要义》2卷、《史类》600卷、《环山楼集》6卷、《三才广志》300卷等等，可谓一代奇才。大约在吴琬介绍下，孙太初在吴兴又结识了隐居的刘麟（曾为工部尚书）、龙霓（曾为刑部员外郎）以及当地人、退職官员陆昆（曾为御史）。在湖州南郊，他们徜徉道场山，泛舟碧浪湖，结为“苕溪五隐”。有诗歌倡和。孙太初有诗称：“一笑长髯意已投，角巾相对草堂秋。看山载酒青藜健，笼鹤寻僧尽日游，浮世事多悲去鸟，野人道在只沧洲。他年寄迹来南墅，小结芳邻水竹幽。”

这一年的夏秋之际，刘六、刘七起义，兵锋直指南京，江南危急。孙太初再度至吴兴，避居湖州南郊，写《避寇吴兴山中二首》诗，吟咏中充满对国难的忧虑。其一：“日暮渔樵散，山空河汉明。柝声悲永夜，戎马闭孤城。去国美人尽，感时黄叶生。酒杯徒自好，极目一沾缨。”其二：“露下虫声杂，蓬门月色沉。灯明人按剑，风急虎行林。南国兵戈满，中原涕泪深。衲衣挽不及，卧病北山岑。”

明代中后期政治专制残暴，极为昏庸。才子名士隐居，并非不关心政治或世事人情，恰恰相反，他们身在江湖，却以更加敏锐犀利的判断关切朝野，论断是非，言多剝切，从而引动名公巨卿侧目，折节

与之交。这些隐士大多自称“山人”，而孙太初就是明代“山人”群体的开创者之一。

正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，孙太初在西湖隐居七年之后，再度来到吴兴，决定隐居湖州南郊。归安县举人施侃（字邦直）仰慕孙太初的文采风流，撮合将妻妹许配与他。孙太初为此也在湖州南郊归云庵附近筑造居所，安居下来。郑善夫为其题名‘挂瓢堂’。归云庵在道场山南麓百步栈旁，因唐僧皎然有诗：‘相思一日在孤舟，空见归云两三片’，由此得名归云庵。“挂瓢”的典故，出自东汉蔡邕《琴操》，说隐士许由喝水没有器皿，总是以双手捧水喝。有人赠他一个瓢，许由用瓢舀水喝了之后，将瓢挂于树上。风吹树，树动而瓢晃，发出声音。许由以此为烦扰，取而把瓢扔掉。后世以“挂瓢”为隐居或隐者傲世之意。

太初在《新筑苕溪草堂成》诗中说：“白沙翠筱净江潭，新筑堂成映色寒。旋有飞鳧临钓石，即看浴鹭傍清湍。扁舟此日鸥夷子，木榻经年管幼安。长暇南邻呼酒伴，一樽相对坐林峦。”而此前，他在南郊经常寄宿归云庵。如《宿归云庵》：“沙清竹碧鸥出飞，野老候余开石扉。暮云卷雨日初落，木叶满山风乍稀。酒杯入夜意自好，篝灯向人寒相依。穷幽览胜乃吾事，坐爱名山忘独归。”另一首《宿归云庵》中他写：“独坐山中寺，境闲真意存。瓦灯燃石壁，松叶暗柴门。夜久无群动，诗成偶自言。上方钟意早，山意落前轩。”大有陶渊明隐意。

他的新居落成之日，邻居农民送给他箬笠草蓑，让他大为感慨。他的《草堂落成，邻渔以箬笠草蓑见遗》诗：“卜筑苕溪上，幽居景自賒。杜陵今避地，庞老喜移家。石榻青霞满，山樽白月斜。邻翁惠钓具，云水足生涯。”

孙太初诗风中有浓厚的隐逸气息。在南郊隐居中，孙太初交接吴兴本地大量文人墨客，也不时有人前来请教求学。不久，他的妻子又生了孩子。他的《幽居》诗：“小结幽居苕水上，坐分沙草地应偏。鸣鸥浴鹭春长满，翠木凉云江可怜。白日著书真自适，青山招隐不虚传。扁舟亭上时来往，独有侯芭问《太玄》。”而道场山是他经常游历、吟咏的地方。如《游道场山》：“伏虎昔年寺，塔留雷半焚。我来白日静，钟落青山闻。乱石开云气，晴池散鸟群。迟回兴不尽，林叶落纷纷。”再如《至日携搯登道场山》：“瞥眼风尘岁屡迁，椒盘栢酒自留连。半生作计闲为上，到处论交山最贤，好句忽成黄叶寺，小舟漫倚白鸥天，松声泉语无人会，独坐岩头意已传。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景色。比如《吴兴浮碧亭》：“浮碧亭前湖水平，拍槛呼酒双眼明。青天不动钓丝卷，白鱼入手渔舸轻。悲风万里动南纪，落日一望遥东瀛。沙鸥野鹭少机事，道人亦有沧州情。”孙太初也有浪漫激情的时候，那就是闻知天下太平、江湖得以安宁的时候，如《闻江阴解围喜而独酌烂醉》：“好音慰我静风尘，漫喜呼儿笑语新。夏武有诗歌盛代，江山无恙著高人。短蓑月下形应古，白酒床头计未贫。安得尽闻烽火息，一瓢长醉太平春。”大有老杜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欣喜若狂的意境。

孙太初并非不染纤尘、不问世事的世外真隐士；相反，他只是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和政治生态的恶劣环境，宁愿安居林下、静观世态的高智商、真性情名流。在湖州南郊，他不享受锦衣玉食、佩虎符、坐皋比的豪华庄严，但是他沉潜于一种飘逸绝伦、行藏在我的自由与任性。当世文坛以李梦阳、何景明等“前七子”最盛，天下莫不归附。而孙太初以江湖布衣，挺世独立，不与之合流，诗风效仿宋人，赢得了举世尊重。

正德十五年（1520年），年仅37岁的孙太初先生溘然长逝于湖州南郊苕溪挂瓢草堂，在众多友人主持下，他的遗体安葬于挂瓢堂(亦称苕溪草堂)附近，并树立墓碑。去世前，孙太初已经卧病多时。他安详地为自己安排了后事，并留下书信给朋友，告诉大家可以为他做点什么。他留下了523首诗以及“挂瓢”的精神意象与追求。他在世时诸多当朝豪俊、江湖名流、草野隐士就都拜服他的才华横溢、诗文超世绝伦；如顾璘说他：“龙笛吟风，鹤瓢酌月，皎皎太初，江湖之杰。”顾璘有工部尚书的官职在身，为方便见他，曾道衣幅巾，放舟湖上，前来拜访。孙太初去世后，当时文坛领袖李梦阳为之撰《太白山人传》，表彰他的事迹，论其“有超轶才”。挚友殷云霄撰文赞其“凡感佚思作，可喜可愕，可悲可嗔，一以寓之，发之以豪纵恣肆，时出入畦径”。

太初先生留给诗坛的是典型风范，留给地方的还有更加深刻的寓意。在杭州西湖和湖州南郊归云庵侧他曾经的居所，都被称作“挂瓢堂”。自正德至晚清，“挂瓢”一直是游历这些名胜时文人嘉客大发

感慨、吟诗作赋时的高频词汇。后世不断追念他的时候，也着力虚构了他的形象：太初先生成为总是一手拿鹤瓢一手握铁笛子的世外仙人。

因为凭吊太初先生挂瓢堂故地的诗文太多，清乾隆年间，乌程陈焯干脆将晚明吊孙太初的诗篇汇辑为一本书。陈焯并有诗盖棺论定太初先生：

“斯人不复作，地下亦吾师。海内毁遗字，人间有旧诗。寒郊山鬼语，古墓老僧知。千载归云寺，犹存十字碑。”

可见当时对太初先生神往敬仰的程度。

到晚明，孙太初遗留世间的片言只字如手稿、书画、遗物，都被当时达官贵人收藏，传世以为珍宝。清乾嘉时期甚至有人宣称藏有太初先生的铁笛或者鹤瓢。清初，吴梅村寻访湖州孙太初墓，见其破败不堪，出资重修，并建了一座“太白山人亭”，又撰《修孙山人墓记》，对孙的形象描述为：“为人渥颜飘须，携铁笛、鹤瓢以自随。”，并填《满庭芳》词，称：“铁笛横腰，鹤瓢在手，乌巾白袷行吟。仙踪恍惚，埋玉旧烟林。”

诗人施闰章与吴梅村同访孙太初墓，在太初墓旁，二人酣畅饮酒，抒怀赋诗：“于乎山人何如人，挂瓢词翰今犹存。”，王曾祥《高士坞怀孙太初》诗：“太白山人披褐徒，自华入衡还入吴。鹤瓢铁笛身与俱，光价倾动士大夫。”

吴梅村之后，康乾时期，湖州诗人严遂成，也多次游历南郊，撰诗吟咏太初先生：“真隐何妨与世缘，贵游掩至亦恬然。夹衣冷卧云

归寺，铁笛横吹月上船”。他述及：“今南山归云庵，有挂瓢堂，墓在其旁，余数往游，如见山人乌巾白袷，吹铁笛饮酒谭论时”。

乾隆初年，知府李堂致仕离任前夕，再度参拜太初墓，撰文称：“百步栈旁为归云庵，庵右为孙太初挂瓢堂。古松合抱，微风遽至，涛声琅然，万壑皆应。予守湖十一载，每岁来游，低徊不忍去。”晚至清末，虽然经历岁月风尘，但太初先生在南郊的旧迹，尚依稀可见。只是进入近代以来，挂瓢堂被急切功利的熙熙攘攘喧嚣所冲淡，再也绝少有人去寻访挂瓢堂的遗迹，甚至极少有人知道南郊还曾有一段“挂瓢”的公案，令人唏嘘。